

CAMBRIDGE

“英国病”：到底是英国病了还是我们疯了？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 1850-1980

[美] 马丁·威纳 著

王章辉 吴必康 译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Martin Wien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 1850-1980

[美] 马丁·威纳 著 王章辉 吴必康 译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462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 1850—1980 / (美) 威纳 (Wiener, M.) 著; 王章辉, 吴必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301-22857-9

I. ①英… II. ①威… ②王… ③吴… III. ①文化史—研究—英国—1850～1980

IV. ①K56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2194号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ISBN 978-0-521-60479-6, by Martin J. Wiener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书 名: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 1850—1980

著作责任者: [美] 马丁·威纳 著 王章辉 吴必康 译

责任编辑: 张善鹏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857-9/K·097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19 印张 270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献给 Julie 和 Wendy

国家也像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想象之中。

——因诺克·鲍威尔 (Enock Powell, 1946)

译者序

我们将威纳的著作《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译成中文出版，向广大读者介绍一位美国史家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供研究大国兴衰问题的读者参考。

英国在 19 世纪曾经是世界工业霸主，但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先后被美国和德国赶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后来又被法国、日本超过，还一度落到意大利后面。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 2012 年 1 月发布的统计，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排名降到第六位。学术界和政界对一个世界头等强国衰落的原因都怀有浓厚的兴趣，多年以来，许多人都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和探讨。

英国的衰落既有相对的一面，也有绝对的一面。所谓相对衰落，是指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比其他主要经济体慢，相对实力减弱。绝对衰落主要表现为殖民帝国的土崩瓦解，世界霸权地位的丧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下降，某些工业部门的衰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但经济上的衰落从总体上来说是的相对的，因为在 20 世纪，英国的总体经济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居民的生活水平都超过了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从 19 世纪末期就开始了，两次世界大战加快了这一趋势。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起，英国经济长期发展缓慢，失业率居

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这种情况被称为“英国病”。对“英国病”的起因，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研究著作大量涌现，从凯恩斯主义到自由市场理论都一一尝试过，用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三大经济要素来解释，也不能得出圆满的结论。马丁·威纳的这本专著独辟蹊径，力图从思想观念和文化形态学的角度对英国衰落的原因进行探讨。威纳的著作于198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和政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评论不断，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也有提出补充看法的。他的书被研究者广泛引用。

马丁·威纳当时是美国休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这本专著曾荣获美国历史学会罗伯特·利文斯顿·斯凯勒奖，先后翻译成意大利文和日文，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

威纳的书分四篇八章，作者在书中对英国现代文化的价值观、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上流社会的重组、乡绅价值观对工业价值观的改造、反工业主义倾向及其对政党、教会和劳工运动的影响、实业家的绅士化等问题分别作了阐述，并就英国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了总的评价。

威纳指出，英国实业家在19世纪创造了世界第一流的物质文明，但并未使工业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在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反而屈从于绅士文化和土地贵族的价值观，工业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受到压抑，工业主义内含的进取精神被弱化，工商业者在社会上不受尊重。成功的工业家为了追求社会地位，花大量金钱到乡间购买地产，建造宅邸，甚至放弃工商业活动，去追求上流社会的时髦风尚，结果造成进取精神衰退。在乡绅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上的企业经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地位低下；银行界与工业界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关系，银行业宁愿把资本输出国外，也不愿向工业投资，以致在新的技术革命浪潮到来时，表现为工业投资不足，技术更新迟缓，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速缓慢，结果使工业吸引资本的能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也损害了银行业本身。这种情况使电子工业、汽车产业、合成化工等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为英国

的衰落埋下了种子。

英国教育也受绅士文化的影响，从课程设置到指导思想都渗透着对工商业的鄙视，学校忽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实用知识的教学，许多学生厌恶工商业，结果这个国家虽然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却缺乏足够的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作者认为，在保守主义思维模式下，竞争受到遏制，创新精神受到压抑，变革受到怀疑，对经济效益的关注被斥为“保守主义”，人们习惯安于现状，这种保守主义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的后果就是工业精神的衰落。所有这些都被威纳看做英国经济相对衰落的原因。

作者指出，公学和牛津剑桥等名牌大学对上流集团世界观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这类学校教育有严重缺陷，从课程设置到指导思想都渗透着对工商业的鄙视。它们崇尚古典文学，忽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实用知识，视工程技术和工商业为低贱行业。经过这种教育的熏陶，不仅上流阶级的子弟看不起工商业，就是实业家的后代也接受了乡绅阶层的享乐文化，淡化了其父辈的价值观。

到 20 世纪，虽然“纯科学”在高等学府的课程设置中占了一定的地位，但应用科学仍被忽视。在美、德、法、日等国工业很容易招募到高质量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人才，可是在英国，公学和大学的高材生很少人愿意去工商业部门工作。工业企业缺乏足够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威纳用很大的篇幅讲述乡绅文化观的影响。在英国文学上，以乡村田园风光为主题进行创作成为一种时尚。作家把工业城市描写成丑陋的怪物，尽情歌颂乡村静谧、安适、停滞不前的社会环境，以此反衬对城市工业文明的厌恶。作者引用英国一系列思想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述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约翰·穆勒对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理想持怀疑态度，查尔斯·狄更斯反对工业资本的价值观，安东尼·特罗洛普对商业的作用表示忧虑，马修·阿诺德辛辣地批判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约翰·罗斯金强烈地憎恨工业社会。

以上名人在英国文化史上固然多有建树，却也反映了一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时，不能洞察社会发展的前景、寻求克服社会弊端的途径，而是顾盼已经逝去的时代，企图回到古老英格兰的田园生活中去。

威纳指出，在英国政界，无论托利党（保守党）、自由党还是工党，都渗透了乡绅价值观的影响。许多政治家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绅士。保守党政治家斯坦利·鲍德温自喻为“农夫”，他坚持乡村“永恒的传统”和古老的价值观念，反对商业主义侵蚀。曾任工党首相的拉姆齐·麦克唐纳也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老式、好沉思的乡下人，英格兰古老传统的继承者。乡绅文化妨碍了政治家把主要精力用来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教会也加入了反对工业主义的大合唱。教会的高级教职人员也对工商业抱厌恶和非难态度。一些教会人士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不感兴趣，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在于将人的兴趣从物质方面转到精神方面，幻想建立一个生产问题不再起支配作用的社会。

在保守的思维模式下，竞争受到扼制，创新精神受到压抑，变革引起怀疑，对经济利益的关注被斥为“实利主义”，人们习惯安于现状。这种保守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的后果就是工业精神的衰落。

威纳就英国乡绅文化对工业价值观的改造、地主乡绅对工业资产阶级的同化作用、保守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所作的分析，无疑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是，像许多西方学者一样，他在强调自己的观点时，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英国经济衰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把经济缓慢发展和停滞不前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乡绅价值观的影响，也像单纯的经济解释一样，是片面的。作者过分夸大了反工业主义倾向，并把文学上对工业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与反工业主义混为一谈。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不能从社会发展不平衡方面去分析原因。

英国的相对衰落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威纳在书中提到的乡绅价值观、教育体制的弊端等以外，还有一些更重

要的原因。英国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曾在世界工业中占据垄断地位，它在技术上的优势地位无人可以与之匹敌，它的工业品行銷全世界，在世界市场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别国发展工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钢材、铁路器材和船舶等都要从英国进口，英国可以获取大量超额利润。但好景不长，到 18 世纪，美、法、德、俄等国也先后开始和完成工业革命，这些国家所需的工业品可以自己生产了，而且还把多余的产品输出国外，走上了与英国竞争的道路。这些后起的国家还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用高关税保护本国工业，使英国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遇到了日益激烈的竞争，产品出口困难增大。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技术设备相对陈旧，在 19 世纪下半叶发生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时候，虽然英国是许多新技术的发明者，但因受陈旧设备之累，资本家不愿意大量投资改造旧有的设备，以致科学技术成果不能及时地转化为生产力，而后发的美、德等国家还在工业革命进行中就赶上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它们在采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方面走到了英国的前面。美、德等国的钢铁工业、合成化工、电力和电子工业、内燃机和汽车工业等领域以飞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在经济效率和生产增长速度方面都快于英国，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世纪之交，在工业生产总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成为后者强有力的竞争者，使英国丧失了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在国际市场上的处境日益恶化。

英国没有对在工业革命时期形成的工业结构及时地进行调整，长期倚重纺织、钢铁、煤炭、造船等大宗产业，而这些传统产业部门因受到其他国家的强烈竞争，出口遇到困难，生产力严重过剩，而前景好的新兴产业又发展较慢，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英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殖民地和附属国是英国廉价原材料及食品的重要来源地、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和工业品销售市场。这一市场的存在对减少英国的工业品销路的困难起了一定作用。但殖民地市场需要的多为中低端的产品，过分依赖殖民地市场妨碍了英国企业家去改造企业的设备和改进经营管理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当殖民帝国土

崩瓦解以后，尽管它在原有殖民地的经济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但它的垄断地位日益受到其他工业国家的挑战，影响力逐渐下降，这对英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英国在研究和开发(R&D)方面投入的资金和人力比其他工业国家少，而且投资不当，把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军工领域，致使在新技术开发方面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英国企业未及时进行体制上的创新，未及时吸纳法人公司的管理技术和组织形式，根深蒂固的制度结构像集体谈判工资的制度、教育与生产的脱节、银行与工业的松散联系、国际贸易的格局、国家—企业关系等都长期沿袭下来，体制上的弊端抑制了生产系统的改造。19世纪英国公司内部结构简单，典型的商号是由所有者或有亲属关系的人管理，管理人员少，企业规模小，成本计算和生产控制粗放，生产技术的发展主要靠经验，而不是靠系统的研究。直到19世纪70年代前，企业财政主要靠个人家庭财产、利润再投资，只在有限的程度上依靠地方银行。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发展了有限责任公司和地方股票市场。当然，英国并不是完全没有采取新的管理制度，只是在转变的速度和规模上比较缓慢。即使现在，英国企业在成本核算、营销手段、技术革新等方面也做得比它的竞争对手差。体制上的缺陷、管理制度的惰性，妨碍了对生产结构进行及时的调整。

英国企业没有正确处理好劳资关系等，囿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劳资双方的利益经常发生尖锐对立，企业采用新技术经常都意味着部分工人失业，当企业准备搞技术革新时，常常遭到工人群众的反对，劳资矛盾阻碍了技术革新的顺利进行。还有一些别的原因，这里就不细讲了。

作者的观点是英美等国研究英国相对衰落原因的流行观点之一，将此书译成中文对我们了解西方学术研究的动向和研究英国相对衰落的原因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

王章辉

2013年3月于北京

新版导论

本书在酝酿时，正值英国“受过教育的舆论界”已经丧失了对民族、国家和其前进方向的信心，这是好多世纪以来未曾有过的。同时发生的帝国的终结、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主义的再现、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让位于欧洲邻国，使那些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和形成英国舆论的人处于一种新的不确定的环境之中。带有像“英国向何处去？”之类标题的文章和书籍涌现出来，甚至有影响的月刊《冲突》(*Encounter*)发行了以《一个民族的自杀？》(*Suicide of a Nation?*)为题的专刊。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以复兴国家活力、“在技术革命的热潮中打造一个新英国”的口号作为1964年选战的主题，这次选举结束了保守党十三年的统治，尽管威尔逊的政府随后就陷进了迅速变化的当代世界的不利漩涡。六年以后，当工党再次投入选战时，民族复兴这一新的诺言主要被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领导的政敌加以利用。希思的保守党政府也未能履行诺言，他的政府在因矿工罢工而使英国雪上加霜的世界石油危机中垮台。十年政治上的承诺令人痛心地失望，结果国家的“复兴”成了比单纯政党变化更复杂、更捉摸不定的目标。到1974年，在对公共事务前所未有的忧郁气氛下，对现代英国史的严肃反思已经期待已久。

到此刻为止，对英国现状和发展方向的新的忧虑对专业史写作的影响甚微，当政治上更激进的新一代人也开始留下自己的印迹，他们仍停留

在对进步“宏大叙述”的辉格陈旧道路上。那时主要的创新是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汤普森(E. P. Thompson)为首的“从下到上历史”的奠基,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作为进步史中心人物的工人阶级和工会人士与工人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塑造上,而不是把中产阶级激进分子和开明的辉格党人,甚或人道的帝国主义者当做“主角”。“劳工的挺进”,而不是自由民主抑或一般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成了写作前两个世纪历史的新中心议题。然而,60年代和70年代初历史学家中的激烈争论,的确注意到了那时公共事务讨论中盛行的对国家当前形势的强烈疑问。

当希思政府和这个国家经历1973—1974年那多灾之年的动荡时,我正在英国度假,利用这一机会研究20世纪关于国家“现代化”的思考。当前的麻烦和这一世纪的思考,似乎都需要相互联系起来考虑。我最初受过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训练,我发现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和停滞问题的用语过于狭隘。我坚定地相信,正如凯恩斯(J. M. Keynes)所指出的那样,当代“务实”的人都比此前更多地认同已经过世的那些人的思想。但是,我与我这一代许多其他思想文化史家一样,已经不满足于狭隘地、精英式地聚焦于少数特出的思想。我的视角在扩大,可以包容多数人所持有的远不那么缜密和严格的思想和情感,这些人构成了比一套特定想法更宽泛的思想架构——德国人将此叫做一个时期和地方的“时代思潮”(“Zeitgeist”)或“精神风气”。我开始相信,就像有争议的政治家因诺克·鲍威尔曾经说过的那样,“国家也像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想象之中”。

在20世纪70年代公共动乱的背后是否逐渐形成了这种“想象”呢?当我在写早先的一本关于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期的思想家和社会主义活动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的书时,我才知道,19世纪“资产阶级”的特性已经改变了,它正在战胜(如传统历史所说)古老的贵族阶级:它接过了那个阶级的许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外部标志。他们刚刚获胜,商业、工业和城市生活似乎就因他们的许多失误而又受到指摘。与此同时,新近对民族特质的强烈关注出现了,其中过去的及其想象的美德

起了关键作用。这意味着什么呢？或它对英国当前的问题有什么重要东西可说吗？

在这当儿，我接触到了年青一代聚集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 周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像汤姆·奈恩 (Tom Nairn) 和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那样的作家被问道：为什么所期待的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未获得成功呢？在寻求对这一政治问题的答案时，他们提供了与我的观念发生共鸣的英国史的范例。他们争辩说，因为其工业革命发生的独特时间，英国从未发生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现存强有力的统治阶级已经能够容纳和吸收新的资产阶级。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没有其自称那么“现代”的独特国家。如果比单纯政治含义更宽泛地采用奈恩和安德森模式，那可以为当前的社会经济泥潭和过去一个世纪令人惊奇的中产阶级反现代文化的兴旺提供一种解释。

我的形成中的“工业精神”图景，归顺和包含在 19 世纪英国文化史中，我在 1974 年春天的两个报告中，就将它与那种含义的某些政治和经济后果提出来了，其中一次是我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主持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另一次是在哈德逊欧洲研究所组织的阿斯里奇管理学院会议上对与会的实业和政治领袖听众提出的。在这两次报告中，特别是最后一次，我力图让历史学界和公共政策演讲进行卓有成效的结合，尝试提出最新历史发展的苗头和当前进退两难的历史根源，或许可以撒播某些思想种子，以期以后生根发芽。

此后我回美国执教，一些学术和个人事务使我放慢了写作进度，以致此书到 1981 年初才面世。那时另一届工党政府陷入社会困境，接替它的保守党政府本身也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政府在日益增大的压力下，着手扭转其紧缩货币和放开市场的激进新政。这是重新评价现代英国历史基本路线的恰当时刻，本书得到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的大量评价以及预期中的专业历史学家的更多补充。正如理查德·英格里希 (Richard English) 和迈克尔·肯尼 (Michael Kenny)

所注意到的那样，这是“受到学术界和更广泛的读者重视的第一篇重要‘衰落论者’的文章”^①，它既被政府成员当做对一个世纪之久的错误方向追根溯源并寻求加以改正的论著而加以引用，也被某些批评家当做他们控诉政府“出卖英国工业”（1982年电视节目特别根据本书而采用的标题）的依据。自然各方都从书中摘取对其直接工作有用的东西，但是双方对我在写这本书以使当前的困局更容易被理解方面所作的真诚努力都有回应。

我在书中提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文化界对工业革命的破坏性力量的反应，迅速地把阻碍经济创新和增长的价值观和态度灌输给中产阶级和上中产阶级。并非像19世纪中期可能出现的那样，得到全国性认同的不是工业制度、技术、资本主义或城市生活，而是植根于变化缓慢的“乡村”生活方式的价值观。这种反响受到像公学、牛津剑桥那样的机构以及可能过类似贵族生活方式的机会的滋养。其结果是，“工业价值观”的兴起受到抑制，工业和技术职业的地位明显地低于政府或专业人士。更显著的结果是，经济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具有活力，政治体制不那么支持经济的发展。

除了对现行政策含义的直接兴趣（并非没有关系）外，本书也激发了大量的学术讨论与调查研究。事实上，本书的一个贡献无疑是加快了商业史、技术史以及英国历史上社会文化对经济行为影响之研究的发展。二十年来，评论家专注于经济行为的特殊问题及教育体制和贵族生活方式对之发生的想象的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可以显著快一些吗？公学和旧式大学真的阻碍了这样的发展吗？工业家和潜在的工业家在其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绅士化”了吗？就算是“绅士化”了，他们是否明显地阻碍了经济发展呢？

当然书中很多地方都可以批评。本书作为一位理智的历史学家的作品是可以争论的，在赋予其更有力的思想，而且在开辟一个新领域时，时常不得不在证据基础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工作。像公学毕业生未来的职业以及

^① Richard English and Michael Kenny, eds., *Rethinking British Decline*, 2000, p.25.

工业家购买乡村地产倾向那样的问题尚需进行仔细的研究，在这类事情上，本书在阐释论题和挑选例证时，必定仅做了一些粗线条的勾画，而没有量化大量的证据。正如新近的评论家汤普森（F. M. L. Thompson）在 2000 年所注意到的那样，“文化是一种无常的向导，它是那样的灵活，那样急于讨人喜欢，那样易于塑造为适于任何一种偏见，所以对历史学家来说，超过来源于更客观证据的独立确证的范围去相信它，是不明智的。”^①除了别的事情以外，汤普森还对以下问题提出疑问：是否存在“企业文化”（书中并未出现这个词，它是被本书的保守赞赏者杜撰出来的）这样的东西，或者是绅士化过程（商人和工业家接受“乡绅”和“贵族”的生活方式）是否果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可以量度的有害后果。由于本书评论者和其他历史学家辛勤耕耘的结果，现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比 70 年代末这本书成书时所知道的多多了。无疑，如果今天来写这本书，情况会大不相同。但它还是表达了 70 年代和 80 年代有关英国思潮及英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些重要东西。一个多世纪以来，技术人员和商人们表达了他们相比于专业人士或政府人士受到排斥的感受。他们很多人在读了这本书后，在 80 年代写信给作者重复表达了这样的感受。在几代人中有这种感受的人是那样多，那样强烈，他们不能不说出一些重要的东西，尽管只是“文化方面的”。

此外，多数评论家对这本书的反应是太过热烈了，以致很快就与令人反感的撒切尔政府紧密联系起来，他们还容易误读本书的论据，把它们说得比实际内容更强烈，把对英国经济停滞的部分解释当做全面的解释。甚至在其选定的特定文化领域，也不是将其解读为对工业价值观的抑制或“驯化（domestication）”的描述，而是将其打败。加之，几乎所有评论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本书叙述中的一半内容上——实业阶级的经济行为，而

^① *Gentrification and the Enterprise Culture: Britain 1780–1980* (2001), p.160. Besides Thompson's, the leading critical works are Bruce Collins and Keith Robbins, eds., *British Culture and Economic Decline* (1990); W. B. Rubingstein, *Capitalism, Culture and Decline in Britain, 1750–1990* (1991), and Peter Clarke and Clive Trebilcock, eds., *Understanding Decline* (1997).

忽视了其另一半内容，即反工业价值观和态度对政治论述及政策的影响（其中帝国持续的影响起了关键作用，书中对此讲得还很不够）^①。本书在结论部分转向了政治，并提出，撒切尔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可能不是货币供应或工会（两者都是她的政府执政初期优先注意的对象），而是国家政治和经济领袖的主导想法。所以，正如可以提出证据加以论证的那样，它证明，就布莱尔（Blair）的“新英国”不同于威尔逊和卡拉汉（Callaghan）的英国而言，它多亏了“文化”的议事日程以及其间“撒切尔时代”更具体的法律和财政政策。

因而，在吸收了本书评论者许多有根有据的反对意见后，本书仍然是现代英国史学中的一个界标，它作出了几个不同的贡献。第一，当然是因为它激发了对英国经济史，特别是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英国“经济行为文化”比迄今所知的更大的兴趣，甚至是对“现代化政治”的兴趣。但本书被证明是完全超出了“相对经济衰落辩论”的有代表性和有影响的作品。把经济学作为文化活动来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内外都迅速发展起来。在历史学以外，专业经济学对文化的、制度的和行为的审视角度变得容易接受多了。在历史学领域，商业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实质上获得了爆发式的发展，而特别是在可以称为 18 世纪“工业精神诞生”的研究领域，开始改变我们对工业革命的理解，而工业革命正是像可以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是发明农业后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②。事实上，现在你可以讲有一种新出现的关于工业革命起源的学术共识，这种共识前所未有地赋予 18 世纪英国许多科学家、工匠和商人之间特别密切的关系以更大的作用，后者被

① 实际上，此点评论家们从未指出过，但的确应当详加考察。在 20 世纪，占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帮助支撑了一大帮官僚职业阶级及其倾向于保留现状而不是创新的虚伪的绅士“看守文化”。

② See Margaret C. Jacob, *Scientific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Industrial West* (1997); Joel Mokyr, *The Gifts of Athena: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02).